

知識天地

民族主義的制度分析及其超越

汪宏倫（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民族（或稱「國族」）主義經常被認為是個棘手的研究題目。之所以如此，除了問題本身的複雜性外，人們對於民族主義這種「現代社會的宗教」往往持有一套堅定不移的信念，而「民族觀」（nation-view）也已融入多數人的日常生活，成為「常識」的一部分。如何擺脫這種常識性的看法而提出更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是研究者不斷要面對的課題。

一直到 1983 年，民族主義研究的兩本經典—Ernest Gellner 的《民族與民族主義》與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第一版）—出版之時，民族主義都還算不上是社會科學研究裡的重要題目。到了 1990 年代初期，蘇聯與東歐歷經了「蘇東波」的鉅變之後，民族主義突然「重新」站上世界舞台，成為形塑國際與區域政治的主要力量，而有關民族主義的研究，也開始成為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熱門題目。

正如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變貌讓人捉摸不定，有關民族主義的理論與學說也同樣多如牛毛，令人眩惑。用最簡單化約的方式來說，過去有關民族主義的理論流派，大致上可以二分法區分為幾種對立的觀點，如「本質論 vs. 建構論」，「常生論 vs. 現代論」等。本質論者大致認為民族具有其不可化約的本質基礎（例如種族、血緣、語言、信仰等），建構論者則指出民族與國族認同乃人為建構出來的產物，並非本質上不可改變的事物。常生論者認為民族乃與生俱來，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民族即以不同形式、不同強度存在著；現代論者則是認為民族完全是現代社會才出現的產物，在前現代（pre-modern）的社會中，並不存在所謂「民族」這樣的集體。對當今的研究者來說，上述四種理論無疑是過於簡化的說法；除了少數立場鮮明的極端論者外，現階段的研究大致上都是想要在這兩兩對蹠的理論當中尋求更貼近現實的說法，以期解釋複雜歷史脈絡中民族主義的發展動態。

在過去十多年產生的諸多新研究中，「制度論」（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取徑，是其中頗為特殊且較少為人所知者，值得稍加介紹。標舉出「制度論」的觀點來研究民族主義的，首推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的社會學者 Rogers Brubaker。Brubaker 早期的成名作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1992），致力於探討公民身分與國籍/國格在西歐的形塑與歷史演變過程。在 1996 年出版的 *Nationalism Reframed* 一書當中，Brubaker 把他的理論立場作了更進一步的闡明，援引 1990 年代在各個學科領域（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重領風騷的（新）制度論來分析國族政治。許多人把「蘇東波」之後高漲的民族主義視為是「民族（族群）認同乃深植人性」的佐證，即使經過了數十年共產主義的洗禮，民族主義與族群意識的陰影還是揮之不去，在蘇聯與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之後風起雲湧，成為主導這個區域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Brubaker 則是從蘇聯的制度設計本身來論證民族主義崛起的必然性。Brubaker 區分了兩種有關國族的制度設計，一是政治與管理的領土組織（territorial organization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另一則是人的分類範疇。這兩種制度設計，大致上對應了「公民民族主義」與「族群民族主義」的兩種理念型（ideal types）。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蘇聯的這兩套制度設計無論在法理、空間乃至概念上都不一致，這些內在的衝突與矛盾為日後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同時也導致了解體後獨立諸國內部的民族問題。Brubaker 同時也提出了民族化國家（nationalizing state）、國內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y）以及外部祖國（external national homeland）的三角關係（triadic nexus），藉此來分析東歐諸國複雜難解的民族問題及其動態關係。

Brubaker 的制度論分析，對吾人理解台灣的國族政治，其實饒富啟示。筆者過去曾將此一制度論觀點，進一步擴充為「全球觀點的制度論取向」，從中華民國的制度設計（及其困境）來討論台灣國族政治的肇因與歷程。蘇聯制度化了許多「次國家的民族」（sub-state nations），而台灣的中華民國（尤其是 2000 年以前）則是制度化了一個「超國家的民族」（supra-state nation）；和蘇聯相似，台灣的「公民—領土」與「族群—文化」場域中的制度設計同樣也存在著內在衝突與矛盾，使得國族問題無可避免地浮現。而 Brubaker 所指出「民族化國家—國內少數民

族/族群—外部祖國」的三角關係，在台灣也同樣存在，且圖像更為複雜（如「民族化國家」因民主化與政黨輪替而產生質變）。尤有甚者，無論是在「公民—領土」或是「族群—文化」場域，中華民國體制在國際脈絡中都面臨許多困境與阻礙，這更加深了中華民國的制度危機。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自 1990 年代以來國族政治的激化，其實不能僅僅將之視為（本質性或原生性的）族群意識的興起、或歸因於少數政治人物的操弄動員而已，而應被視為一種制度危機的展現及其反應。事實上，即使是所謂「省籍」或「族群」的區分本身，其實也是一連串制度化過程的國族政治產物。如果忽略了制度層面的分析，可能的危險之一便是在研究當中不經意地複製民族主義本身所製造出來的問題。

制度論的分析當然不是唯一的研究取徑；我們只能說，它從制度運作的角度，為我們解析了國族主義政治當中一個較為人所忽略（或者說，與常識世界脫離較遠）的面向；而也正是這個原因，制度論的分析有可能幫助我們開展新的視野，從而為現實中的國族問題尋找可能的出路。以台灣的國族政治來說，「族群」、「認同」、「統獨」等詞彙概念，經常是政治人物（或民族主義者）動員群眾時反覆使用的語彙；直接使用這些概念來作為分析國族政治的工具，往往會面臨「研究成果被政治人物粗糙地拿來作為動員根據」的窘境，或是遭到「將宰制自然化」的指控。制度分析未必能夠全然擺脫上述問題（這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都難以避免的），但藉由將問題焦點與分析層次轉移到「制度」而非個人或群體本身，制度論的研究希望能在概念工具上避開「族群」、「認同」與「統獨」的泥淖。當前兩岸國族政治的許多僵局，問題其實在「制度面」而非「認同面」或「族群面」（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前者無可避免受到後兩者影響）；如果我們執著在「認同」或「族群」上面來思考問題，恐將治絲益棼。

制度分析除了對於理解台灣的國族政治饒富啓示之外，對於理解其他案例也有啓發作用。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例，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en Pye）曾有一句名言，謂中國其實是個「由文明佯裝成的民族國家」（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文明緣何「佯裝」為民族國家？不外乎制度設計耳。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其制度設計與前蘇聯也有若干類似之處，而中國的國際處境雖和台灣有明顯不同，但從過去到現在，中國在國際上所面臨的制度性排除（institutional exclusion）與差別待遇也有不少；90 年代以來伴隨「崛起的中國」而出現的中國（新）民族主義，很大一部分是針對中國的國際處境而來。制度面的分析對我們理解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也能提供相當的助益。

全球觀點的制度分析，在某種程度上也回應了 1990 年代以來學界一度盛行的可疑論調，即「民族國家（因全球化）的衰亡」。這種論調現在在學界大抵已經式微，但在通俗論述中仍甚囂塵上。從過去十多年的經驗來考察，全球化的過程其實很大一部分是透過民族國家所建立的制度管道才得以遂行，而此一過程其實加強了許多民族國家的制度性特權，因此我們非但沒有觀察到民族國家隨全球化而「沒落」，反而看到其地位與角色因全球化而增強（或轉化）。

制度論雖然不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唯一取徑，但它的確可以幫助我們遠離被民族主義浸透的常識世界，釐清一些研究與思考上的盲點。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國族政治的發展有越來越極端化的趨勢，尤其兩岸的民族主義者，在情感與情緒上有激化的傾向。制度分析也許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些情感與情緒的制度性成因，但對於這些情感與情緒的內在形成過程與可能後果，則無法提出進一步的分析。如何對這些情感與情緒提出更深入的理解與適切的分析，將是研究者未來值得努力的方向。